

●●史学研究

二战期间苏占区波兰难民迁移问题研究

刘兆辉

(华侨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1939年,随着德军和苏军的入侵,波兰领土被一分为二。从1940年2月到1941年6月,身处苏占区的大批波兰人,被苏联政府以各种名义流放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偏远地区。苏德战争的爆发成为这批苏联境内波兰人命运的转折点,为对抗共同的敌人,苏波于1941年7月30日签订和解协议,流放苏联境内的波兰人得以获释。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刚逃离苏联,便又开始了另一场颠沛流离之旅。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离开苏联的难民们辗转异国,流落中东、印度和东非等世界各地。本文拟对这段波兰难民流亡经历作一考察,从中探寻二战期间波兰难民的集体创伤记忆。

关键词:二战;波兰难民;迁移

中图分类号:K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20)04—0106—04

波兰战役是二战在欧洲的起点,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后,不同被占领区、不同民族的波兰人有着各不相同的遭遇。在欧战的蔓延中,苏战区下波兰难民的经历尤为特殊,他们的政治身份一度因战争的时间和战争中的国家关系发生转换。这一历史不仅是波兰人苦痛的创伤记忆,同样深刻影响了战后初期波兰人对战争的思考、对国家的情感和对政权的态度变化。

一、流放苏联境内的波兰难民

1939年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后,收押了近25万波军战俘。对波军战俘的处置从一开始也就纳入了苏联政府的考虑,1939年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会组建了战俘管理局,专门负责处理战俘事务,并在23日颁布《战俘营条例》,对战俘营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部门职能等作出规定,绝大多数战俘被送往位于苏联境内的8个战俘营和2个分配站。在处理战俘问题的同时,苏联也在波兰东部地区进行“苏维埃”化,以实现对占领区的有效控制。苏联当局认为,在波东地区有大量绝对不会接受苏联意识形态的居民,这些人的存在对于苏联来说无疑威胁巨大。于是,苏联当局迅速展开政治行动,“以肃清政治上认为是不可靠的人”。^[1]在进入波东地区后,苏联对当地居民身份进行了

详细登记,包括年龄、性别、种族、信仰、职业等各种信息,这一措施加快了流放的速度。大量波兰平民被以各种政治名义遭遇逮捕流放,“苏联当局针对所有流放行动都使用相同的方式:三人组成一小组,通常是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一名民兵和一名苏联红军战士。他们通常在深更半夜前往受害者家里,这家人只有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来准备不超过每人220磅的物品和食物。”^[2]被流放者则对自己何时、因何原因被捕毫不知情。因为不了解苏联的筛选标准,流放行动在波东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1940—1941年间,苏联对波兰东部的大批居民进行了四次流放迁移。第一次是1940年2月,“迁移放逐的主要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州的定居者及其家属,总计139596人”^[3],这批人主要是农民和林业工人,大多被安置在苏联欧洲部分的北部;第二次是1940年4月,“这次被放逐的人主要是被镇压的波兰军官、警察、宪兵、地主、工厂主和起义组织的参加者的家属,大约6.1万人”,^[4]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被分配到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6个州;第三次是1940年6月,流放人员来自从波兰的德国占领区逃到苏联占领区的难民,定居在西伯利亚和苏联欧洲北部地区,他们中“许多人拒

收稿日期:2020—03—13

作者简介:刘兆辉(1994—),男,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史。

绝接受加入苏联合国籍，因此也被视为政治嫌疑犯。”^[5]；第四次是1941年6月，主要为在苏联入侵时从波兰东部逃到立陶宛的难民，在抵达苏联后，男性被迫同家属分开，被派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劳动营，而家属则被安排到阿尔泰边疆或哈萨克地区。从民族属性来看，被流放者包括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犹太人，但以波兰人占大多数。流放人员的命运也各不相同，第一批的流放人员幸存率相比后来的流放者较高，第二、第三批流放人员即使在1941年苏联特赦令颁布之后，也很少有人能够离开苏联。对于流放总人数的具体统计，学界目前差异较大，从30万到120万，尚无定论。尽管苏联档案中有相关记录，但由于当时苏联以民族属性进行人口分类，内务委员会的记录出于政治原因，部分可能只包括纯波兰族人，而在流放人员死亡率方面也缺乏数据。

被流放者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居住卫生条件很差。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难民，被迫住进由黏土砌成的小屋，而屋顶则是由木条架木板构成，地面则是纯泥土，屋内没有什么家具。“屋顶和墙壁两侧以及地面涂上黏土与动物粪便的混合物，作为防水层。”^[6]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容易滋生臭虫、跳蚤。难民必须前往集体农场工作，以换取食物。定居点临近河流的难民区，家畜和人往往在同一条河流饮水洗澡，卫生状况堪忧，于是一段时间后许多波兰难民自行修建了澡堂和厕所。定居点远离河流的难民，则只能靠井水生活，从而限制了水的供应。许多小孩要去捡拾牲畜粪便，以用于住房防水和冬天取暖。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苏联欧洲北部的难民，尽管部分地区有许多早期受斯大林清洗迫害的人们留下的房屋可供居住，但他们的生存状况同样引人担忧。凡年满16岁的都要参加砍伐树木、运输木材的工作。“即使在冬天，当温度下降到-70℃和几乎没有阳光的日子里，也一样干活。”^[7]食物是根据工作的配额及其完成情况进行分配的，对于那些年迈老人和幼儿来说，只能依靠家庭其他成员的口粮来维持生存。流放地的医疗条件更为落后，在工作中一旦不小心出现伤口，很容易感染，由于饥饿许多波兰难民患有水肿，皮肤类疾病也在难民中不断蔓延。“在西伯利亚，有很多人死于肺炎和毁灭性的斑疹伤寒。”^[8]对于这些波兰难民来说，生存成为他们心中唯一的渴求。

二、苏德战争的爆发与波兰难民的再安置

1939年6月22日，德军对苏联发动进攻，苏德战争爆发，这为苏波之间改善关系和解决各种

问题提供了机会，成为苏联境内波兰难民命运的转折点。战争爆发当晚，丘吉尔通过无线电广播表示欢迎苏联加入对德作战。苏波关系曾是英国考虑对苏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在苏德战事下，重构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是英国急需处理的重大事项，这对英苏关系和对德战争进程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在英国政府的协调下，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和苏联驻英大使伊万·迈斯基于7月5日在伦敦举行谈判。“波兰人有两个目的：苏联政府承认1939年德俄商定瓜分波兰的协议无效；释放俄国在占领波兰东部地区后移到苏联境内的所有波兰战俘和平民。”^[9]在首次谈判中，波兰提出了边界问题，但由于苏联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排除在“民族波兰疆界”之外，苏波就此问题产生争执。西科尔斯基决定先搁置边界问题，但遭到了波兰外长扎列斯基及其他两位内阁成员的反对。7月12日，英苏签订对德作战协定，正式结为同盟，英国不希望波兰问题影响到英苏战时同盟，丘吉尔认为，“波兰将来领土的问题必须延搁到形势好转的时刻去解决。”“主要的盟国在加深了对希特勒共同战斗的伙伴关系的经验以后，将能够在会议上通过友好的讨论来解决领土问题。”^[10]在英国的压力，苏波经过激烈争讨，于7月30日签订了互助协议，即“西科尔斯基—迈斯基”协议。

“西科尔斯基—迈斯基”协议恢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苏联承认1939年苏德协议中关于波兰领土变更问题的失效，双方还同意在苏联境内建立一支波兰军队。除此之外，对苏联境内的波兰难民也作出规定，“苏联政府对所有或是作为战俘或是因其他理由至今仍被关押在苏联的波兰居民，自恢复外交关系时实行大赦。”^[11]这也为后来波兰军队组建中的人员招募提供了基础。但是，由于苏联准备工作的不完善，出现了难民的大规模无组织外流。苏波协议签订后，组建了以安德斯将军为领导的波兰军队。由于无法接收到苏联提供的足够军队物资，在英国的斡旋下，1942年3月，一部分波兰军队获准离开苏联撤离到伊朗地区接受补给和训练，在此过程中，大量波兰平民也随部队撤离。从3月份到10月份，约4万波兰平民分三次跟随波兰军队进入伊朗。需要说明的是，撤离的平民多是波兰士兵的家庭成员，此外包括大量儿童，还有相当一部分难民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离开苏联。“在伊朗，波兰难民住在马厩、军队建筑和帐篷里。英国、印度和波兰士兵、伊朗公民、波兰裔美国

人社区和联合国救济和复兴管理局来照顾这些流亡者。”^[12]撤离的难民们以农民和工人为主,也包括少部分知识分子。随着第一次撤离后难民人数的不断增多,伊朗很难供应规模庞大的难民,再加上1941年英苏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政局动荡,对波兰难民来说也是一个隐性威胁。因此,英国和波兰政府不断寻找更多安置这批波兰难民的地点。除伊朗本土和其他中东地区外,墨西哥和新西兰也接收了少量波兰难民,大多以儿童为主。运送到墨西哥的波兰难民得到了美国的许多帮助,以墨西哥瓜纳华托省莱昂郊外的圣罗莎难民聚居点为例,“美国政府在建立这个村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包括交通、寄宿和照顾一些难民在内的财政援助。”^[13]

东非和印度则是另外两个接收波兰难民较多的英属殖民地。1942年夏季部分波兰平民便开始被从伊朗转运至印度,印度纳瓦纳加尔的邦主贾姆资助修建了瓦里瓦德营地,接收了大量波兰儿童。瓦里瓦德营地是由印度政府管理,其充当着英国政府代理人的角色,继而代表波兰流亡政府的形象。巴拉查迪营地也是印度另一个较大的波兰难民管理点,此外,还有许多临时营地供难民居住。“巴拉查迪和瓦里瓦德营地都有教育设施。在卡拉奇、阿布山、孟买、班奇加尼和其他地方,天主教机构为年龄较大的儿童安排了学校教育。学业结束时,大多数男孩加入了波兰武装部队,被派往世界各地与纳粹作战。”^[14]前往东非的难民则是从伊朗港口或经印度港口转运来的,他们被安排在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东非对波兰难民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落脚点,尤其是疟疾等其他热带疾病时刻威胁着波兰难民的生命。尽管波兰专家就此提出过意见,但需要考虑的是在战争状态下安置大规模的难民,可以预想英国政府也只能作此选择。“在东非地区,1942年成立波兰难民营时的主要目标是为其在农业部门和定居点行政部门中的居民分配工作。”^[15]营地内的难民必须通过工作获得报酬与食物,大多数营地都能自行从事一些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其外出、与当地人的接触受到严格限制。难民营内部的管理是由英国人和波兰人共同完成的,“难民营的责任在波兰人和英国人之间划分,福利服务和日常活动,如宗教、文化、卫生、体育、福利、教育、内部安全和难民营内的工作,是波兰人的责任。英国人负责维持与住宿、安全、健康以及食品和服装供应有关的事务。英国人所需

要负责的事情应该由波兰代表或难民营的代表转达。”^[16]决定波兰难民营一切问题的权力是东非各国政府,但他们从程序上遵从英国政府的指令行事。整个二战期间,这些波兰难民被迫在异土他乡以各种方式生活着,延续着共同的创伤记忆,直到二战结束,他们又不得不再一次面对命运的选择。

三、战后的波兰难民

对众多因战争流亡海外的波兰人来讲,二战的结束并未给他们带来一个期盼中的波兰。随着苏联军队对波兰的解放,共产主义波兰临时政府逐渐掌控了政权。于多数波兰人而言,留在英国或其殖民地或许会是更好地选择。“在波兰流亡者的圈子里,回到共产主义的波兰被视为背叛了波兰士兵为之不懈奋斗的所有民主理念和愿景。”^[17]1945年7月5日,英国宣布承认新的波兰临时政府,这也给英国处理波兰问题带来挑战。安德斯的军队于1946年10月底全部转移到了英国,而他们的家属还都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难民营中。由英国财政官员控制的波兰问题临时财政委员会,接替了波兰流亡政府的财政权,并对流亡中东、印度和非洲等地区波兰军队家属的救济和福利工作负责,英国政府又再次面临着波兰海外难民安置的责任。与此同时,联合国救济总署也在负责难民的撤离工作。这些波兰难民都有流放苏联、饱受政治压迫的经历。对他们而言,更是很少有人愿意再重新回到苏联控制下的共产主义波兰。战后印度反英独立运动和巴勒斯坦紧张的地区局势很容易将波兰难民卷入进去,因此英国加快了对这些地区难民的撤离工作。上述地区大多数难民营到1948年基本都已经被关闭,他们得以前往英国与正在服役的波兰士兵团聚,以后或是定居于英国,或是从英国转到美国、加拿大生活。而在英国没有家属的波兰难民,则去往澳大利亚等国家。

不仅仅是波兰军队与他们在中东、印度和非洲的家属,战后来自其他地区不愿返回波兰的难民,大规模的来到英国。他们大部分在二战中都为盟军作出过贡献,英国政府不得不对难民的到来作出回应,以更好地解决这些波兰人的生活问题。经过议会的准备与努力,英国于1947年3月27日正式颁布了《波兰难民安置法》,在前期难民安置法的制定讨论过程中,内政部大臣伊德曾指出“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使各部门能够接管波兰问题临时财政委员会履行的职能”^[18]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出台专门针对难民群体的立法。法案为英国的波兰难民提供了就业和失业福利的救济,

还规定政府部门对波兰难民养老、教育等方面的责任。“与这一法案有关的许多工作涉及建立波兰移民营。前陆军和空军营地被用作波兰军队及其家属的临时住所。到1946年10月,约有12万名波兰士兵驻扎在英国各地的265个营地。多年来,妻子和家属也被带到英国加入他们的行列,使估计总数超过24.9万人”^[19]在法案的推动下,1947年4月1日英国成立了波兰教育委员会,由议会提供资金支持。委员会通过在英国教育机构中向波兰人传授相关的英国知识和生活方式,以便他们更好地适应在英国的生活。同时,波兰文化仍得到维护。难民安置法一方面帮助了波兰难民融入英国社会,另一方面对英国的经济具有贡献作用。大量波兰人成为战后初期英国经济重建的奉献者,为英国从战争中恢复经济提供了所急需的劳动力。

四、结语

难民一直以来都是战争创伤的最大受害群体,二战中苏占区的大批波兰难民,先是被强制迁移到苏联境内,苏德战争爆发后又经伊朗转送世界各地,他们的集体记忆中唯有为生存而奔波。在苦难之余,二战中波兰难民的经历留给了我们更多研究空间。在欧洲难民危机愈演愈烈的如今,英国的战时和战后难民重置政策有着深刻的思考意义。难民的重新安置既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在特殊时间和情势下又深受国际关系影响并反作用于国际关系。二战中的波兰难民正是一个例子,英波关系给予了许多波兰难民重生的机会,而难民对苏联流放经历的恐惧加深了他们在战后对苏联政权的担忧,他们在战后苏波关系的外围不断产生作用。也正如太平洋战争中,因美日开战被强制迁移的日裔美国人,难民问题徘徊在国际关系和人道主义之间,虽无民族界限,却有着复杂的政治束缚。重新安置是对难民的一种保护,但无法用标尺去衡量它的基准,只能是作为解决难民问题的一种可行手段。

【参 考 文 献】

[1] 姜天明,从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人口的变化[J].历史教学问题,2006,(01):03.

[2][5][6][7][8] [英]哈莉克·科汉斯基.不折之鹰:二战中的波兰和波兰人[M].何娟,陈燕伟,

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168-188.

[3][4] 刘显忠.二战爆发前后苏联对少数民族的迁移[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02):04.

[9][10]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M].韦凡,译.海口:南方出版社,2003:339.

[11] 吴伟.苏联与“波兰问题”:1939~1945[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06.

[12] Mary-Ann Sandifort. World War Two: The deportation of Polish refugees to Abercorn camp in Northern Rhodesia, Leiden: Universiteit Leiden, Masterstudie Afrika studies, 2015, p.24.

[13] Ewa Stańczyk. "Exilic Childhood in Very Foreign Lands: Memoirs of Polish Refugees in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War & Culture Studies, Vol.11, No.2(2018), pp.136-149.

[14] Anuradha Bhattacharjee. "Polish Refugees in India, During an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Sarmatian Review (2013), Vol.34, No.2 (2013), pp.1743-1756.

[15] Mikołaj Murkociński. "Between War and Peace: A Brief Comparison of Polish Refugees' Administrations in East Africa and Lebanon," Prace Historyczne. Vol.146, No.3(2019), pp.565-583.

[16] Mary-Ann Sandifort. World War Two: The deportation of Polish refugees to Abercorn camp in Northern Rhodesia, p.26.

[17] Michael Fleming: Brexit and Polonia: Challenges facing the Polish Communi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Britain leaving the European, London: PUNO Press, 2018, p.46.

[18] Polish Resettlement Bill, 12 February 1947, Vol 433, cc.373-482, <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947/feb/12/polish-resettlement-bill>.

[19] Agata Błaszczuk. "The resettlement of Polish refuge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Forced Migration Review, No.54(2017), pp.71-73.

[责任编辑:张 港]